

# 论方方叙事空间中的地方依恋<sup>1</sup>

董晓平

(吉林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摘要】:** 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它主要体现为人与地方之间的一种特殊情感联结。地方书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可以运用地方依恋进行重新阐释更能够作为研究论证的重要依据之一。方方对武汉进行的地方书写在三个层面上重新分割了其文本的叙事空间:作为原乡符码的地理空间;作为日常俗世的文化空间;作为历史记忆的政治空间。

**【关键词】:** 方方 叙事空间 武汉 地方依恋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8)09-0114-07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地方书写是一个代表作家极具地缘性的创作方式之一。地方书写不仅成为作家表达个人对特定地理空间的感情与思考的一种文学方式,更成为一种展现不同地域文化差异性的重要文化文本之一。对于地方空间的文学叙事表现出人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恋,这种人地关系的情感依恋就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这个术语在西方学界已经横跨不同学科形成一系列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文化现象。在心理学层面上,地方依恋主要指称“与地方依恋的行为成分是指与地方依恋有关的行为及行为倾向”,“地方依恋的认知成分是在对地方的感知觉、记忆等认知过程基础上的态度、判断、信仰、价值观以及地方的象征意义。”<sup>[1] (p87)</sup>

在人文地理学层面上,西方学界主流看法是“所谓地方依恋,即人和某一对他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之间基于情感,认知,行动的一种纽带关系,由地方依靠和地方认同两部分组成,其中地方依靠反映的是当地的休闲设施对于提高人们的精神愉悦的重要功能;地方认同是一种精神性依恋,指某个特定地方被认为是人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并对其持有持久浓厚的情感。”<sup>[2] (p44)</sup>

不论是心理学或人文地理学层面上对地方依恋的定义,其中人地关系的核心部分是情感联结。在文学叙事中文学与人之间的重要联结也是情感表达,所以在文学叙事空间中展现出地方依恋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地方依恋主要表现为作家对于生活空间的强烈情感认同,也即地方认同。对于地方书写而言,方方对于武汉的描写充满一种不同于池莉的文人式叙事空间建构,她笔下的文学空间将人地之间的情感联结予以反复展现,在她的叙事空间中展现出一种人地关系的地方依恋。

方方对武汉进行的地方书写在三个层面上重新分割了其文本的叙事空间:作为原乡符码的地理空间;作为日常俗世的文化空间;作为历史记忆的政治空间。基于此,本文在对方方的叙事空间进行文本细读与重释中,试图找出其关于地方依恋的具体文学表达,找出重解方方创作的新视角,以及这个术语概念对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借鉴意义。

## 一、武汉:作为原乡符码的地方情感

对于作者而言,地理空间不仅是其生存生活的物质基础,更是其表现精神世界与生活感悟的重要文化载体。文学叙事中的地理空间多表现为作家对特定地点的反复描述。莫言对山东高密描绘与痴迷,贾平凹对陕西秦地的眷恋与崇拜,迟子建对北

<sup>1</sup>作者简介:董晓平(1975—),女,吉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

极村的歌颂与回味，苏童对江南水乡的雕琢与反思等。不同地域不同性别的作家都通过文学文本表达出自身对故乡的眷恋，或者生活居住地的浓厚眷恋。

纵观这些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它们具有鲜明故土色彩的地方空间。这些出生并成长于故土的作家，他们在表现乡恋方面浑然天成。作家方方笔下的武汉，作家一方面十分厌弃武汉的种种弊端比如市民气息、码头文化、粗俗语言等；另一方面她十分迷恋武汉的山水环境，融合南北的地方美食，生活节奏与气息等。武汉，对于祖籍江西，出生于南京，生长于此的方方而言，它成了一种故乡的综合体。“与我的老家江西和我的出生地南京相比，它已经是我真正的家乡了。我想拒绝都不行，我不想喜欢它都不行。”<sup>[3] (p292-293)</sup>所以，相对于她真正的祖籍江西与出生地南京而言，武汉成了一种情感与精神上的原乡即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归属地。作家通过描写它的美丑，平凡与厚重来表现出一种对武汉的复杂情感。

对她而言，武汉不仅体现出她的一种第二故乡的依恋，更体现为一种对精神原乡的符码重建。“武汉是方方小说的物质基础和物理空间。”<sup>[4] (p133)</sup>在文学叙事空间中，方方的这种原乡情感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地名的直接表述；地方建筑的渐变勾画；地方语言的雅俗杂糅。

第一，地名的直接表述。它建构了武汉作为方方叙事空间中重要的精神原乡的语词符码。

地名的更迭主要展现了城市的变迁轨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市居住者的精神变化。对武汉的文学书写，作家将其作为第二故乡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描写。在《汉口的沧桑往事》以及《汉口租界》等书或文章中提及了她对汉口地名变迁以及历史事件的回顾，其详实的史料更成为武汉地区的重要文史资料之一。“当作家以汉口市民为描写对象时，自然进入了汉口文化那粗俗市侩的生命状态：以吃喝拉撒睡为程序，以逗情骂俏为娱乐方式，以挣得一丝一毫的实利为目的，以粗俗凶蛮为手段。于是，作家真实的描摹与人物生命形式同构。这就是不做任何情感裁判的零度感情，不做任何艺术裁剪的原生态作风，”<sup>[5] (p270-271)</sup>李俊国先生对方方小说中出现的汉口文化以及文本样态的管窥十分有理据。对于方方曾经工作过的汉口片区而言，这不仅是她试图回归的带有沧桑感的地标性文化区块，更成为其重要的精神原乡。

在《万箭穿心》中，李宝莉作为汉正街的女“扁担”，在繁华且拥挤的汉正街——汉口商业文化的核心符码中被残酷的对待。汉正街成为分裂李宝莉生活的一个重要界限，它连接着她曾经安稳且幸福的生活，也连接着底层辛苦且残酷的生存。汉正街成为她谋生的重要地理空间，也成为她被儿子抛弃，公婆嫌弃的一种精神依靠。作家不仅在小说中将汉正街作为一个地名进行了人物图谱式的概述，同时也展开了她对于李宝莉在底层生活悲剧的重要地理空间的精心选择。所以，汉正街成为一个带有强烈地方情感的地名，也成为作家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符码之一。

第二，地方建筑的渐变勾画。它建构了武汉作为方方叙事空间中物质原乡的实体符码。

在不同地理空间中，地标成为一个具有鲜明代表性的重要文化载体。它一方面承载了城市变迁的厚重历史，另一方面也展示着城市内在精神的文化表征。所以，作家选取了具有强烈地方性，同时能够表现出物质原乡的实体对象。方方对于武昌与汉口的诸多地标都信手拈来，比如昙华林，民众乐园，珞珈山，球场街的“河南棚子”等，这些出现在其文学文本中的地方建筑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带有历史沧桑感变迁的历史建筑，比如珞珈山，晴川饭店；另一类则是具有鲜明文化性的文化建筑，比如民众乐园，昙华林等。这两类建筑都是方方笔下重要的物质原乡，它们承载了作家对于特定时期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

在《春天来到昙华林》中，她写道“昙华林夹在武昌城边的两座山间。山并不高，但也足够挡住人视野。一座山叫花园山，一座叫螃蟹岬”。昙华林，螃蟹岬这些耳熟能详的武昌地标，不仅是武汉文化空间建构的重要部分之一，同时也成为武汉文化的标志性符码。方方对诸如这样的地标描写，不仅可以描绘出武汉文化空间的分布，同时也能够形成一种作家独有的对物质实体的一种原乡建构。这些散置在不同空间内的武汉地标也成为衡量城市生活的不同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样，在《武昌城》中作家通过详细的历史史料展开对武昌城的历史反思。比如方方在其创作中所说“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把这场战事记录下来，

---

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们经常路过的大东门，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小东门，曾经有如此多的人在此长眠。”<sup>[6] (p61)</sup>城市的历史变迁一方面表明城市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则成为凝聚城市过往记忆的物质载体。

第三，地方语言的雅俗杂揉。它建构了武汉作为方叙事空间中文化原乡的地方符码。

武汉方言对方而言，并不是一门十分好学的语言。她认为武汉方言说起来并不好听，但机缘巧合听到陈伯华的武汉话以后，她觉得这方言是很好听的，只是武汉人不屑于将它说好一些。武汉方言的语音是下沉的，音调也十分低沉，特别是一些带有“脏话”味道的词语穿插其间，更会带来许多的阅读尴尬。不过方方却巧妙地运用武汉方言俚语塑造出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使他们跃然纸上。在《落日》中同样使用了大量方言俚语来表现人物的市俗与真实，比如成成与汉琴刚出民众乐园后遇到一阵风的对话。汉琴说“搞么鬼事名堂？”成成回答说“闯到鬼了”，汉琴继续说“莫说得骇人，我晚上会做噩梦的。”<sup>[7] (p6-7)</sup>这段对话中出现的武汉方言俚语带有十分明显的市民气息。

武汉方言不仅能够反映出地方文化的细枝末节，更成为了解城市经济文化面貌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武汉方言的粗陋，泼辣的理解，应该基于对武汉地方文化的熟悉与认同。文学文本中出现的武汉方言不仅让读者直观感受到语言的地方性，更能够将武汉文化的主要特征即粗粝的市井气息表现得生动有力。所以，作家在观察日常生活的时候，也将其中最能够表现城市文化的关键词进行了复现。

武汉作为一个地理空间，可以通过地图或者图像等展现，但文化层面主要依靠它的地名，地标，以及市民气息的俚语方言得以完成。这些不仅成为武汉历史文化积淀的实体，更成为作家重要的个人记忆，它贯穿了作家的生活经验与地方情感，它们都凝聚在作家的文学叙事空间中。

## 二、小人物:作为日常俗世的地方认同

作家对于武汉的地方认同主要存在于其文本的叙事空间中。她一方面对作为生活空间的武汉产生了所谓的厌恶与摒弃，认为小市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难以消融；另一方面她却在字里行间透着对武汉的地方文化的深刻印象，比如饮食或空间场所的把握。所以，对方而言，武汉作为一个地方认同的主体，主要通过文本空间的小人物得以展现。小人物的底层生活充斥着武汉的在地性，同时小人物也运用了武汉文化的碎片构筑了一个世俗的武汉底层空间。

日常俗世的地方认同主要成为方方表达对小人物在武汉特有文化空间的一种身份认同。这种地方认同主要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个体的庸常化和群体的市井化。

第一，个体的庸常化。它成为表现出方叙事空间中小人物对武汉的一种庸常化生活状态的认同。在她的小说《万箭穿心》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李宝莉作为城市普通个体的庸常化生活状态不仅成为展现其生活逐渐堕入窘境的重要证据，更成为展现武汉独有的汉正街扁担文化的一种文化认同。

李宝莉与马学武本身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的结合之初就是故事悲剧的导火索。李宝莉是武汉工人家庭出生的小市民，马学武是农村飞出的金凤凰。武汉的大江大湖孕育了李宝莉超乎常人的耐心与勤劳，同时也带有十分鲜明的泼辣，世俗的市民气息。当马学武出轨被抓的时候，《万箭穿心》给李宝莉的庸常化带来了更多的悲剧性。一方面是李宝莉无法摆脱城市鸡毛蒜皮之下的婚姻悲剧，两个不同背景的人为了各自需要组成的婚姻注定是悲剧；另一方面李宝莉从争强好胜到忍辱负重的养家责任，让她成为一个更加底层卑微的个体，彻底消除了其作为女性的女性特质与幸福可能性。作为在武汉生活的本土女人，她并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光鲜亮丽，充满自由的选择人生的诸多可能性，她因一个看似迷信的房屋风水问题走向了个体的庸常化，走向了被公婆/儿子嫌弃的边缘人形象，这一切都是她性格造成的结果，她的要强与霸道导致了作为女性的生活悲剧。“自己当年一念之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和人生，包括她自己。”<sup>[8] (p246)</sup>如果在其他的小说中，人物本身带有一种改变命运不公的主观

意图的话，比如《风景》中的七哥，《出门寻死》的何汉晴等，李宝莉则是完全被生活选择的边缘人，她的努力使她更加的卑微与边缘，她无法弥补自己当初犯下的过错。公婆与儿子始终站在道德制高点，用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她的庸常与不幸，并没有对她进行任何的救赎与认同。所以，李宝莉的悲剧更多来源于自己对庸常化生活状态的认同，以及个体庸常化无法改变的残酷现实。

《中北路空无一人》主要叙事了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退休工程师病倒住院，其下岗工人的儿子郑富仁特殊而又发人深省的一系列事情。郑富仁被其小学同学金刚唤作“郑穷人”。下岗职工的身份成为分割其自我认同的重要标记。

郑福仁对于母亲离世后，父亲的续弦行为产生了一种摒弃与厌恶。这种厌恶来源于其父亲对他生活的严苛。武汉重型机床厂成为化解这种严苛与反叛的重要转折点。郑福仁对于父亲的崇拜来源于厂子的繁荣与鼎盛，这也同时带动了周围同学对他的羡慕。“那壮观的场面引起了同学们一连串的惊呼。”<sup>[9] (p79)</sup>但是伴随着时代的更迭与母亲的逝世，郑富仁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生活的窘迫通过父亲入院后，他们夫妻为土鸡汤的对话可以知道，他们生活的拮据与艰难。在送土鸡汤到医院的途中，一辆飞驰而过的卡车不仅将土鸡汤撞泼，更将郑富仁撞伤。从卡车上掉落的一个大麻袋便成为人性的试金石。郑富仁对于大麻袋的态度变化充分说明了好人好事的两面性。一方面，郑富仁认为卡车司机应该赔偿他以及他的土鸡汤，自行车，所以将大麻袋带回家当作抵偿。刘春梅作为其妻子在经过金刚的说法诱惑将大麻袋中的羊毛衫低价销售。这都说明了人性中的世俗性，下岗工人的庸常化，他们有着人性的自私与现实生存的压力。另一方面，当父亲说教郑富仁需要认真地做一件事，起码做个好人的时候，他决心去寻找这个大麻袋的主人并归还。他们的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人性的善良。这些曲折的经历加深了对于下岗工人的深刻认识，也塑造出武汉底层市民的市侩与善意的人性矛盾。第二，群体的市井化。它成为表达方叙事空间中独有的市井阶层群体生活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不同的生活阶层的群体的生活细节的展开，比如互相谩骂，为蝇头小利的钩心斗角等，作家表现出武汉城市空间内底层群体的粗鄙与市井化。“武汉市民精神的特征就是火爆热烈的生存。”<sup>[4] (p137)</sup>同时她也刻画了知识分子面对这种市井生活的一种被迫市井化倾向。

在她的小说《风景》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群体生活的窘迫与无奈，以及在这种极端环境中的个人行为都代表了作为底层群体的市井化。小说中描绘的十一个人即父母与儿女们都挤在球场街附近的“河南棚子”，一共就 13 平方米的板壁屋，一张小床。作家这样的环境设计就为后来人物的命运转机提供了一个叙事背景。空间的逼仄，家庭人员的众多，环境的恶劣注定不会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公平的对待，以及良好的成长环境。两个女儿在搭建的暗楼睡觉，儿子们则睡在地上，这种男女之间的成长差异也为后来的人物性格变化做了铺垫。儿子迅速长大导致逼仄空间得更加拥挤，也形成了他们动物一样的生活秩序。七哥睡在床下，遭受最恶劣的环境。他的这种生活境况来源于其父亲对他血缘的质疑。父权威威依然存在于底层群体之间，更加坚固与难以摧毁。七哥 5 岁左右就开始捡破烂，捡烂菜叶，在家庭中没有得到过任何的温暖与关爱，这也促成了他的市井化性格——见利忘义。对于这个生活在武汉市却十分贫穷的家庭而言，他们每一个人组成的“河南棚子”群体带有鲜明的人性劣根性。打架，互相谩骂，粗俗的生活习惯，相互嫉妒等都成为非家庭的群体性争斗。父亲脾气暴躁对任何人都是拳打脚踢，母亲风骚无比唯独对父亲忠诚，大哥经常吵架性格也十分暴躁，三哥打人有瘾充满了对女人的憎恶，五哥六哥也是无恶不作的坏孩子。七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后抛弃了自己相恋两年的女友，转而投身到更好的利益上，娶了一个丧失生育能力却背景深厚的女人。当七哥逃脱了这个小群体环境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摆脱底层命运，摆脱市井气息的有脸面的人。但是实际上骨子里的那种鄙陋与市井早就深深扎根难以改变了。他回到那个残破的家里依然跟其他兄弟一样狂吼，一样的肆无忌惮的张狂谩骂。所以，《风景》将一个家庭作为缩影展现出“河南棚子”区域底层生活的真实状态，更试图展现在武汉生活的更多类似的底层家庭的市井生活的无可奈何。这种对底层群体的冷峻描写，以及赤裸裸的人性揭露都让武汉的底层生活带有浓厚的码头气息，市井气。

《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主要叙事机械厂女工瑶琴下岗后新的爱情故事。其中对于瑶琴的下岗描述充满了一种无意识的严肃。当厂大会宣布下岗职工名字有她的时候，“瑶琴呆了。好多人都回头看瑶琴。”胃在作者随后的叙事中表现出两点：第一，

瑶琴的下岗成为其人生转折的关键点，也成为其失业游荡在家不断回忆与死去男友杨景国上班往事的重要契机。“下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从此没有了收入，意味着她被她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集体遗弃了，意味着工厂不要她了，意味着她从此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人了。”<sup>[10](p199)</sup>对于瑶琴而言，下岗切断了她生存的物质基础，虽然有微薄的补助，但并不成为其享受生活的资本。另一方面杨景国与瑶琴的爱情记忆全部都存在于那个厂子里。所以她作为下岗工人的庸常化便跃然纸上，她在乎生存的物质基础，所以很讨厌斤斤计较的陈福民，因为陈老师总是认为瑶琴有足够的钱，不需要出钱做什么，所以从来没有为瑶琴花过钱。在陈福民与瑶琴之间除了生理需要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情感基础或者共同爱好。底层工人的庸俗与市侩通过他们的所谓恋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武汉文化包容许多方面比如码头文化，江湖文化，市井文化等，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而言，他们不论是作为悲剧故事的个体，还是作为难以逃脱窘境的群体，都表现出了作家对底层文化的一些认同。“武汉的包容性和驳杂性仍然是有自己特色的一它不像北京和上海那样具有包容世界(尤其是欧美)文化的大气，却自有鲜明的地方性，市井味。”<sup>[11](p68)</sup>

方方通过对小人物的细致描摹，展现出生活在武汉的个体或群体对于武汉这座城市的情感认同，不论是自私，冷漠，嫉妒，狂躁还是坚守，努力，宽容，善良都杂糅在作家的现实与想象的文学叙事空间内。日常生活的重复碾压了试图改变命运的普通人的希望，它的庸常化将人物对于武汉的依恋逐步加深，形成一种难以反抗的个体悲剧；同样它的市井化则将人物对于武汉的爱恨情仇表现得更加深刻，形成一种难以摆脱的群体生活缩影。

### 三、大江大湖:作为情感联结的地方依靠

人地关系的核心在于表现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结，它在文学叙事中主要表现为地域文化。

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在人地关系中核心是情感联结，即人与地方之间特殊情感的联结。方方作品中的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结主要通过以上的两个部分展开，即武汉作为叙事空间的重要背景，以及小人物作为其叙事空间中核心主体。

这种情感联结主要表现为小人物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庸常化日常生活，以及武汉的独有码头文化，市井文化的地方认同感。对于方方叙事空间而言，情感联结主要来源于作家本身的人生经历，其次来源于她对于武汉本土文化的细心反思。所以，人地关系中地方依恋的核心是情感联结，这在文学叙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值得研究。

武汉作为长江流域中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不仅具有极强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多带有极强的地域辨识性。所以，长江成为贯穿其历史变迁甚至影响个体生活的重要对象之一。江城的历史记忆伴随着不同年代生活主体的情感变化展现出这座城市的地方历史演变。江城中最为重要的历史对象即:长江，东湖。大江大湖是对武汉这座城市作为直观的印象，也成为方方笔下出现频繁的叙事对象。

第一，长江作为情感投射的镜像意义，对它的叙事展现出作家的江水眷恋。

在小说《暗示》中，作家将自己出生地南京与武汉通过长江贯穿成了女主人公叶桑的情感投射的镜子。叶桑内心的情感变化通过作家对江水的描写而显得与众不同。方方着重描写了两次重要的江水场景即第一次是叶桑怀疑自己的丈夫邢志伟背叛后的出门乘船顺江而去；第二次是叶桑经历了自己身体出轨与清楚父亲的感情悲剧后乘船过江返家而来。

第一次对江水的描写充斥着一种情感上的失落与无奈，“船过之处，像一把锐利的刀，将平展的江水开肠剖肚。”<sup>[12](p5)</sup>文中的“开肠剖肚”将叶桑离开家的失落，以及发现丈夫背叛的一种痛苦心情展现出来，此时的江水成为映射出其情感变化的镜子。伴随着叶桑回家后看到江水，江水成为一个指引情感归属的标记。“船在她意识空白中到达了汉口。当叶桑看到了龟蛇两山和江汉关的大钟时，一刹那间竟有些惊愕。”<sup>[12](p7)</sup>在无意识之间，叶桑随江水乘船回到武汉，回到了情感归属地——武汉。长江成为

一个重要的指引将其带到了娘家。

第二次对江水的描绘则是蕴涵复杂的情感内容，叶桑经历了自己身体的出轨，消解了其对于邢志伟的耿耿于怀，却加深了对自己情感方向的迷失。“轮船单调的马达声使得江面上越发显得空寂。”<sup>[12](p37)</sup>叶桑并没有离去的悲伤，更没有返家的兴奋，而是在平静中回味这趟旅行的荒唐。所以，“叶桑在凝视着这种燃烧时觉出自己的燃烧。燃烧的身体几欲呈现升腾之势。她无法直视这燃烧的天空，因为她恐怕自己会在这燃烧中化为灰烬。”<sup>[12](p39)</sup>作家在描述江水之外将早上初升的太阳比做叶桑的情感，这情感虽然经历了身体的出轨又被激活，却无法逃脱江水的滚动。所以，江水在此时形成了一种情感变化上的对比参照，揭示出叶桑作为女人的内心挣扎与期待。

作者对于江水的描写展现出女人如水的情感变化，这种情感通过江水形态的变化展现出新的地方记忆即叶桑对于自我寻找的江水隐喻，所以长江成为小说《暗示》展现情感投射的重要镜像。

第二，东湖作为精神愉悦的社会意义，对它的叙事展现出作家对生命感受力的重视。

对于东湖的描绘，尤其是东湖附近东亭的社会记忆主要集中在其小说《声音低回》中，小说描述的主人公巴里即阿里在失去母亲后习惯听哀乐，东湖成为化解这个生活难题的去处。作者在小说之初曾经介绍过东亭的地理位置“倘说东湖路和迎宾大道两者形成钝角，博物馆和美术馆便是这钝角尖上左镶右缀的两颗明珠。”<sup>[13](p8)</sup>随后，东亭便以对比的参照物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东亭，便深藏在报社背后，像是胆怯地蹲在大楼的阴影之下。”<sup>[13](p8)</sup>这样的叙事基调表现出阿里生活空间的底层性。

地方依恋在人文地理研究中除了对地方认同的关注，更多是对休闲设施给人带来的心情愉快的地方依赖。东湖作为一个 5A 级的风景旅游区在小说《声音低回》中同样带给了罗爹爹以及众多附近晨练居民的精神愉悦感。

作家在描绘东湖的时候，将东湖作为罗爹爹精神愉悦释放的重要场所予以叙述。“罗爹爹练拳的树林边，已经有好几个爹爹婆婆在活动。东湖人少地旷，四下空气新鲜，是晨练的好地方。四周的居民得此利，喜欢来此锻炼。”<sup>[13](p75)</sup>这是直接对东湖作为休闲场所的描写，另外也通过罗爹爹的间接言说表达出东湖作为人精神依赖的重要证明。“是呀，每天不练几下，浑身不舒服。”<sup>[13](p55)</sup>以及罗爹爹之子的佐证“天太冷了，我叫爸爸莫去东湖，他非要去。说是练惯了，不去不舒服。”<sup>[13](p71,72)</sup>这些都说明了生活在东湖周边的人们对它有一种天然的身体依赖，以及一种深厚的精神依赖。麦克·杰克维兹(Michal Jaskiewicz)认为公共空间是城市日常生活中一个关键部分，它的质量和美学值得特别关注。这种公共空间的美学价值是形成它重要质量的关键，它直接影响人们身处其中如何感受，如何接受它。对于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而言，他认为“地方依恋是一个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的积极因素，它能够传递与表现出一个人对自身居住区的自豪感。”<sup>[14](p573,578)</sup>

对于作家本人而言，武汉也成为一种情感依赖。“我觉得这个城市对我而言，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sup>[15](p73)</sup>文学叙事空间中的地方，比如方方叙事空间中的武汉，它不仅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更作为一种带有作家与之相关的浓厚感情的依恋对象。文学恋乡不仅是一个文学创作绕不过去的母题，更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叙事对象。方方对于武汉的依恋，形成了一种文学书写中独有的地方感，即通过阅读作家的地方特色鲜明的文本可以引起对真实地方的想象与感受。这种地方感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早已被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个人对特定的地方赋予了特殊意义，而使得个人与之产生正向情感联结并希望与该地方维持长久的紧密联结，这样便使得这个地方具有了精神层面上的意义，产生了地方依恋。”<sup>[16](p586)</sup>

对于文学叙事空间中的地方依恋而言，它必须与地方感和地方认同予以区分。对于地方依恋而言，精神上的原乡返归不仅代表着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孤独与异化，更代表一种物质与精神分裂的不可抗拒的现代性分裂。对于方方的文学叙事空间而言，她对武汉的感情既是迷恋的，又是厌倦的，这种复杂的情感促成了她对于武汉生活空间的细碎解读，也形成了她雅俗共赏的文学文本创作。文学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作家对于生活的感受，尤其是在不同的生活空间的日常经验感受，充分表明了一种作家与地方之间的情感依恋。这种对于熟悉生活场景的把握与写作，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阻碍了作家表达生活的更多可

能性。

## 四、结语

作家在自己生命旅程中的大部分时间身心都会停留在一个熟悉且依恋的地方，这个地方对于作家而言就是物质家园，精神原乡。但是这种过于熟悉的生活往往会遮蔽作家对于宏观生命的多样化体验。虽然行走或田野采风可以弥补作家体验生活的局限性。对于书本的间接地方经验的阅读，以及身心短暂的别处之旅都无法摆脱作家对地方依恋的狭小视野。当作家写完了熟悉的生活场景，看透了身边的日常轨迹，便会出现一种对地方依恋的反抗。这种反抗表现在文学叙事中就是文风转变。方方对于武汉的城市生活的写作多集中于 80-90 年代之间，纵观近几年其作品具有一种明显的返乡意识，将写作场景及视角安排在农村与更加多元的文化层面，比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水在时间之下》以及最新备受争议的《软埋》等。作家的这种写作转变一方面来自作家本身的身心需要，年龄与阅历的不断深化促成了对文化层面的多元思考，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对熟悉地方的反抗，期待能够挖掘非惯性的新经验与视角。所以，面对地方依恋在文学叙事空间中的存在，研究必须始终保两面性的态度，既看到地方依恋为陌生读者提供了一种文化文本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则看到地方依恋带来的熟悉感所限制作家更多创作可能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文学叙事空间中地方依恋不仅应该成为透析作家精神原乡的方式，更能对具有鲜明地方书写色彩的作家比如方方的创作进行一种新视角的解读。地方依恋不仅是来源于人地关系的衍生物，更成为现代性在文学空间嬗变后的一种结果。对于失去精神家园的个体，寻找并依托精神原乡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使命。方方对于武汉的书写，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但却又扎根在现实生活空间的细节中，对于这种“新写实主义”的地方依恋更具有一种文化层面的归属感。所以，地方依恋对于文学叙事空间而言，不仅来源于作家的生活经验的表达，更成为展现底层小人物生活风貌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文学叙事空间中的地方依恋也成为方方对武汉进行书写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地方依恋并不是在单一的学术语境中被营造的关键词，而是一个跨学科的重要学术对象。文学叙事的作用同样也能够佐证地方依恋的知识合法性。“符码本身对思想和感觉的回响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力量，因为这些力量决定于一个互动密合世界的存在。没有这样的一个世界，符号与标记没有差别。”[17] 胃所以本文分析方方的叙事空间中的地方依恋也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对于同类型或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相关的文本解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 参考文献:

- [1] 古丽扎伯克力. 地方依恋研究进展:概念, 理论与方法[M].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5).
- [2] 黄向, 吴亚云. 地方记忆:空间感知基点影响地方依恋的关键因素[J]. 人文地理, 2013, (6).
- [3] 方方. 武汉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4] 刘保昌. 论方方小说的武汉书写[J]. 中州学刊, 2017, (3).
- [5] 李俊国. 在绝望中涅槃:方方论[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 [6] 方方. 你知道武昌城吗? [J]. 当代作家评论, 2011, (5).
- [7] 方方·落日[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 [8] 方方. 万箭穿心[M]. 北京:东方出版中心, 2012.
- [9] 方方. 行为艺术中北路空无一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10] 方方. 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
- [11] 樊星. 汉味小说与汉味文化[J]. 文艺争鸣, 2015, (4) .
- [12] 方方. 暗示[M]. 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 [13] 方方. 声音低回[M]. 武汉:海豚出版社, 2012.
- [14] Jaskiewicz, M. (2015) .Place attachment, place identity and aesthetic appraisal of urban landscape, Polis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46, (4) .
- [15] 方方. 我的城市我的文学[J]. 图书情报论坛, 2007, (3) .
- [16] 李春霖, 曾维希. 人与地的联结: 地方依恋[J]. 心理学进展, 2018, (8) .
- [17] 段义孚. 经验透视的空间和地方[M]. 潘桂成, 译. 台北:编译馆, 1998.